

奧地利國家的建構及奧地利人認同的型塑

杜子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一部奧地利史常被學界形容為沒有自身所屬主體民族的國家發展史，詳觀其實，自中世紀晚期以降，奧地利逐步在德意志世界及中東歐地區擴展其影響力，其涵蓋的領域愈形遼闊，終而將大批種類紛繁的各支民族納入麾下，並憑之發展成為歐陸一方之霸甚至於獨霸的地位。然而過往可供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統治並駕馭的多元民族，至 19 世紀近代民族主義浪潮風起雲湧之後，卻成帝國致命缺陷，為維繫多民族大帝國的屹立不墜，所謂奧地利的自我民族認同，不僅不受重視，甚至橫遭哈布斯堡統治當局所摒拒。迄一戰結束後，奧地利第一共和國建立之後，奧地利才首度以單一民族的國度而出現，卻因長期以來受到德意志認同及德意志歷史文化的牽引拘絆，使奧地利國族的認同感難以建立。直到二戰結束以後，才因國際因素及欲擺脫戰爭罪行的牽累，使奧地利國族的認同感快速發展並定型化。本文旨在分析奧地利國家建構與奧地利民族認同型塑兩者之間的關聯性，藉由對奧地利複雜的國家發展史的剖析，將能釐清奧地利民族形塑歷程上的高度困難性之所在。

關鍵詞：奧地利、東部邊區、哈布斯堡帝國、德意志人、奧地利人

壹、緒論

近現代西方歷史學界在探討到奧地利國家及其所屬人民的歷史之時，普遍會以「奧地利的歷史是一個沒有國族的發展史」來作為評論（Beller, 2007: 9）。之所以會有如此觀點的出現，係因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之前，生活在奧地利這片土地上的絕大部分人民並不將自身定位奧地利人，而係自認為德意志人，他們從根本上拒絕所謂「奧地利民族」來作為自我認同的定位。

於此就勾勒出一項本質上的問題，亦即何以居住在一片名為奧地利土地上的人民，千餘年以來竟未因斯土斯民緊密聯結情感而發展出奧地利民族的自我認同感，而是將自身族群屬性定位為德意志民族？究竟過去千餘年的奧地利歷史是如何在沒有所謂國族的歷史中發展？而奧地利與德意志世界兩者之間又呈現著何種關聯性？何以二戰之前奧地利人民以德意志而非奧地利民族定位自身？以下本文期望透過對過去奧地利歷史作一全面概要式的綜覽，或將有助於從根本上釐清奧地利民族認同問題的高度複雜性之所在。

行文之初，將以綱要導覽的方式先行針對奧地利國家的發展史作一簡要的回顧，藉此釐清其與德意志世界千絲萬縷般的複雜關係，藉由觀察這個原發跡於德意志東南方的政治單位，在歷史過程中逐步建構成為一廣大且多元民族的大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從中可供吾人深刻體認出，何以其所轄領域的人民在建構出自身認同感的過程中，先天上所面臨到種種糾結難解的困境之所在。其後則進一步觀察，受制於近現代外在國際局勢的變化及制約下，多元族群大帝國崩解之後的奧地利，其所屬人民是如何在茫然失措下而被迫逐步發展出自身國族認同感的歷程，其間國際環境、政治力的推動皆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亦是值得觀察重點之所在。

貳、奧地利國家發展的背景及其爭議

今日奧地利國家形成自何時？其疆域及其所屬的人民應如何界定？若純粹就今日奧地利所轄的疆域，亦即一戰結束後的 1919 年所建立的奧地利

(第一) 共和國作為論述主軸，無疑地將使問題的答案相對單純許多，其因在於生活在這個時期之後的奧地利國家疆域內的主體民族，幾乎是單一民族，在論述之際，幾乎不會牽涉至複雜的國際因素及民族問題，而且在討論僅僅將近 100 年的當代奧地利國家發展史，對之可以作更詳實及細膩的分析探索。然而如此論述觀點卻會出現一項極大的缺陷，即歷史文化斷層的問題，諸如當代的奧地利共和國是如何形成的？今日奧地利的語言、民族及文化屬性與德意志民族及文化高度類似，兩者之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聯？因此要解答上述問題，無論如何不可能不追溯至 1918 年，即一戰之前的奧地利歷史發展，如若不將一戰之前的哈布斯堡帝國的歷史，甚至更久遠之前的奧地利歷史發展作一簡要的陳述分析，則將難以清楚釐清今日奧地利國家在建構過程之中的高度複雜性。

當然將申論範圍擴及於 1918 年以前的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史，雖能解開歷史文化斷層的問題，卻不免同時亦會面臨到另一項麻煩，亦即歷史上奧地利地區雖作為哈布斯堡帝國的核心領域，然而其與其他廣大的中東歐地區卻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係因哈布斯堡家族在歷史發展上，藉由不斷擴張而將廣大中東歐地區納入其版圖之中，於是欲分析討論到哈布斯堡帝國的歷史發展，則不可能不探究到中東歐各國併入哈布斯堡的歷程，以及其他非德語的族群與哈布斯堡帝國間的互動關係。然而若以此種角度切入奧地利國家史而作觀察，則將不可避免地將會使論述篇幅急劇膨脹，從而使針對不同時期歷史事件的觀察與分析失之過簡。上述兩項觀察視野，皆有其優缺點，因而本文試圖結合兩種觀察視野，即由奧地利先史開始，歷經巴本貝格及哈布斯堡兩家族統治奧地利的歷程，而至今日奧地利第二共和國的發展現況作一概括扼要的說明，期能有助於後續複雜的奧地利民族建構問題的剖析。

參、從巴伐利亞之東部邊區到作為德意志及中東歐地區主宰的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

奧地利這片領域最初與日耳曼及其後的德意志世界發生關聯，約在 6 世紀末期至 7 世紀之時，當時係作為巴伐利亞 (Bayern/Bavaria) 的邊防轄區而出現。其時的中東歐世紀正處於部族大遷徙的混沌年代，源自歐亞草原的游牧部族阿瓦爾人 (Avars)¹ 及為其征服並充當其前鋒的斯拉夫人 (Slavs) 不斷侵入今日的德境東南疆地帶，為了建立一道穩固的邊界防禦線，巴伐利亞人從這個時期開始，逐步沿著多瑙河谷向下推進，此係第一波「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Die Deutsche Ostsiedlung/German Eastward Migration or Eastern Colonization) 行動²。在經歷與阿瓦爾人與斯拉夫人的艱辛軍事鬥爭之後，最後成功地逐步將其前哨防禦地帶向今日奧地利的中

¹ 阿瓦爾人即中國史書上所載之柔然人，隸屬於土耳其語系諸部族之一。柔然人自 4 世紀開始，分向東及西方展開遷徙擴張行動，向東推進的柔然人約在 4 至 5 世紀之交時，逐步稱雄於漠北草原，成為當時鮮卑拓跋氏所建的北魏帝國邊防大患。朝西發展的柔然人則約在 6 世紀中期左右進抵黑海之濱，其後並建阿瓦爾汗國於潘諾尼亞 (Pannonia) 平原，予當時西方的東羅馬帝國 (後質變為拜占庭帝國 Byzantine Empire) 及法蘭克王國 (Kingdom of Franks) 極大的威脅 (Kinder & Hilgemann, 1964: 113)。

² 巴伐利亞人向今日奧地利地區的擴張、移民及拓殖行動，係屬「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行動的第一階段。歷時千餘年之久的「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行動」，總共有三階段的發展，分別為 7 至 11 世紀、12 至 14 世紀，及 17 至 19 世紀初。在這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德意志及歐陸西部的人口過剩壓力、德境教會欲向中東歐地區傳播基督教義、中東歐及東歐各國統治者的招徠德人的入境墾殖，以及若干德意志諸侯欲向德境以東之地擴張其勢力，致而有大批德意志人在這段時期移向中東歐及東歐地區。其移入行動大抵以和平方式而進行，時亦有武力征伐之舉。在 19 世紀中期近代民族主義浪潮席捲全歐之際，德意志及斯拉夫學界皆將此一事實視為「德人向東壓進」(Der Deutsche "Drang nach Osten") 行動的體現，然而詮釋角度則完全相反：一方將之視為歷史上英勇德意志人東進的先鋒，另一方則醜詆其為千年德人東侵的惡行。德人東向移民拓殖史的意識型態化，乃至於其後進一步被充當雙方政治鬥爭工具的發展，對 19 及 20 世紀的中歐及中東歐政局影響深遠，一戰及二戰德軍的兩度揮軍東向中東歐及東歐即與此密切相關，而二戰結束後，大批德意志人橫遭中東歐及東歐各國暴力驅離，導致高達近一千五百萬的德意志人被迫遷離其原鄉，以及中東歐與東歐德意志人移殖區幾乎全部消失的後果，亦係基於強烈反德情結及該史實遭政治工具化的結果 (杜子信, 1998)。

部及東部挺進。時至 750 年終將今日的上奧地利（Oberösterreich）、下奧地利（Niederösterreich）、克恩滕（Kärnten）、敍泰爾邊區（Steiermark）及克萊恩（Krain）等地區，納入巴伐利亞領域之內，正式設置「巴伐利亞的東部邊區」（Bayerische Ostmark），其領域大抵涵蓋今日奧地利大部分地區。

其後法蘭克王國君主卡爾（即後來的卡爾大帝或查理大帝或查理曼 Karl der Grosse/Charles the Great/Charlemagne, 747-814）在 8 世紀後期征服巴伐利亞人之後，旋在 803 年盡滅阿瓦爾汗國，並另置一邊防轄區以統治之，此即「潘諾尼亞之東部邊區」（Pannonische Ostmark）。該邊區所統轄之域甚為遼闊，一直延伸至廣大的中東歐地區，整片潘諾尼亞平原皆在其轄區之內。

然而自從法蘭克王國在 843 年三分之後，德境東南疆開始步入多事之秋，由於東法蘭克王國卡洛林王室長期衰頹不振，百餘年間東部邊區先後陷入大摩拉維亞王國及另一支西遷的游牧部族馬札爾人之手。直到 10 世紀上半葉，東法蘭克王國告終，德意志王國代之而興之後，局面始有改變。955 年，德意志國王鄂圖一世（其於 962 年加冕為帝並正式締建德意志第一帝國，是為鄂圖大帝 Otto I. der Grosse, 912-73）³ 率領德意志各部聯軍，與馬札爾游騎決戰於南德奧格斯堡左近的列希菲德（Schlacht auf dem Lechfeld bei Augsburg/Battle of Lechfeld），馬札爾殘餘勢力退回潘諾尼亞，

³ 德意志第一帝國最初為德意志王國「薩克森王朝」（Dynastie Sachsen）鄂圖一世（即鄂圖大帝）正式締建於 962 年，最初的正式國號為「羅馬帝國」（Romanum Imperium），時至 1157 年「霍亨史陶芬王朝」（Dynastie Hohenstaufen）之時，國名改為「神聖帝國」（Sacrum Imperium），至 1254 年，國名再次變更為「神聖羅馬帝國」（Sacrum Romanum Imperium），直到 1486 年「哈布斯堡王朝」（Dynastie Habsburg）時期，因帝國領域縮小僅侷限於德意志，遂又再次易名為「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Sacrum Roman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由於該帝國名稱在歷史發展上不斷更易變動，援引之際常因時空變化而不勝其擾，是故本文逕以德意志第一帝國稱呼之，此較符合德文史著以「德意志國家」（Das Deutsche Reich）之名來涵蓋千餘年德意志人在其領域上的發展歷史，凸顯德意志歷史發展上的一致性，亦較符合許多國內外的史著上以第一帝國、第二帝國及第三帝國來分別稱呼 962 至 1806、1871 至 1918 及 1933 至 1945 年的德意志人國家的用法。

稍後一轉其游牧生活方式而成爲農耕型態，成爲日後的匈牙利王國。

甫獲大捷的鄂圖一世隨即重修東部邊區，惟因馬札爾人已立國於潘諾尼亞，因而此一重修後的所謂「鄂圖之東部邊區」(Ottonische Ostmark)，其轄區僅及於今奧境北端 (Schödl, 1995: 21)。鄂圖大帝最初將此一邊防要地託予其親信布克哈德，至 976 年鄂圖大帝之子鄂圖二世在世之時，又將鄂圖東部邊區轉予巴本貝格家族路易波德，遂開啓了巴本貝格家族 (Haus Babenberg/House of Babenberg) 入主東部邊區之始。

巴本貝格家族統治奧地利係從 976-1246 年，歷時達 270 年之久，在該家族長期的統治之下，爲後來奧地利的政治、社會及經濟方面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今日「奧地利」之名，即是在巴本貝格家族統治時期所形成的。約從 10 世紀末開始，巴本貝格家族在東部邊區的統治權日趨穩固之後，時人漸漸稱呼該家族所統轄的東部邊區爲「東部國度」(中古德語 Ostarrichi, 今德語 Österreich)，轉爲拉丁文即爲「奧地利」(Austria)，此係奧地利之名出現於歐洲歷史之始。其後巴本貝格家族處心積慮地透過聯姻政策的推行，來擴增該家族及奧地利在德意志世界的影響力。經過數代的努力，終在 1156 年德意志第一帝國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一世(「紅鬍子」腓特烈 Friedrich I. Babarossa, 1122-90) 在位之時，成功地擺脫原本隸屬於巴伐利亞公國的從屬地位，一舉晉升成爲奧地利公國，成爲第一帝國重要諸侯國之一 (Raff, 1987: 27)。

由於與第一帝國中央關係益形密切，使得巴本貝格家族倚之爲後盾，全力投入奧地利境內的各項建設的推動。今日維也納城的大力興築及其被訂爲奧地利京城地位，即係於 1145 年巴本貝格家族的奧地利公爵亨利希二世 (Heinrich II., 1107-77) 統治時期所確立，其子雷歐波德五世 (Leopold V., 1157-1194) 即位之後，更投入大筆經費於維也納及奧境東部、多瑙河流域及阿爾卑斯山區的各大重鎮的修築與闢建，爲後來奧地利晉升成爲往來東西方的交通貿易孔道及樞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雷歐波德五世之子雷歐波德六世 (Leopold VI., 1176-1230) 統治之期，更是步入了奧地利公國巴本貝格家族的全盛時期，雷歐波德六世藉其父祖所打造的基業，進一步促使奧地利公國發展成爲當時往來歐陸四域的交通要衝之所，商業貿易極爲熱

絡，奧地利全境為之欣欣向榮（Higounet, 1986: 152）。雷歐波德六世統治下的奧地利公國亦發展成為德意志境內重要的文化重鎮之所在，可能是德意志世界中最著名的史詩《尼布龍根之歌》（*Nibelungenslied*）即出現於此一時期，該史詩作者不詳，然很有可能是出自於奧地利的佚名詩人。《尼布龍根之歌》對後世德意志學界影響層面極大，不僅後代德意志文人作家以之為基礎而創作出大量作品，其影響力甚至超出文學界之外，波及於歷史、音樂，甚至於政治層面上，尤以近現代為然。

由上可見，巴本貝格家族統治下的奧地利公國在德意志世界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如果巴本貝格家族在奧地利公國的統治能夠賡續不輟的話，很有可能奧地利公國會成為德意志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單位，甚至最後將主導德意志政局的發展並完全融入德意志世界之中。然而由於巴本貝格家族在 1246 年的斷嗣，使得奧地利歷史的發展自中世紀後期之後，由原來具有單純的德意志特性一轉而加入了許多非德意志的因子。13 世紀中期，奧地利公國巴本貝格家族最後一位統治者過世，在經過一段列強激烈競逐的混亂時代之後，奧地利公國的所有權最後在 1278 年落入了哈布斯堡家族魯道夫一世（Rudolf I. von Habsburg）之手（Niederstätter, 2007: 40），正式開啓了奧地利史上的第二個、同時亦是最後一個統治家族—哈布斯堡家族（Haus Habsburg）的紀元，該家族從 1278 年入主奧地利公國開始，一直延續至 1918 年一戰結束哈布斯堡帝國戰敗解體為止，歷時長達 640 年之久，係歐洲歷史上統治時間最久的家族。

哈布斯堡家族入主奧地利公國之後，其政治目標絕不僅只於以統治奧地利公國為滿足，而是尋機將其雄心擴及於德意志及廣大的中東歐各地區。早在入主奧地利公國之前，魯道夫一世即憑藉與德意志其他家族間的密切關係而於 1273 年被選為德意志國王，其後並被加冕成為第一帝國皇帝，是為第一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Dynastie Habsburg*）之始。該家族所建之王朝從 1273 年一直延續至 1918 年解體為止，其間除了 1309-1438 年共計 130 年的「盧森堡王朝」（*Dynastie Luxemburg*），以及 1742-1745 年間的德意志雙強—奧地利及普魯士對決的「奧皇位繼承戰爭」（*Österreichischer Erbfolgekrieg/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48*）時期，哈布斯堡家族

掌控帝國中央曾有中斷之外，總計前後 500 餘年之久，第一帝國的帝位皆由哈布斯堡家族中人所掌控，其宰制第一帝國政權之勢，可見一斑。該家族大展其縱橫捭闔之長才，完全主導了中世紀晚期以後的德意志第一帝國政局的發展。

除了積極擴張其勢力於德意志境內之外，哈布斯堡家族同時也透過種種聯姻繼承等策略而先後在 1438 年加冕為波希米亞及匈牙利國王，使其版圖分向德意志及中東歐 (Eastern Central Europe) 地帶擴張，從而將其影響力完全擴及於奧地利公國的疆域之外 (Waschek, 1996: 22-23)。亦因此故，自中世紀晚期以後，哈布斯堡家族所統轄的民族種類，已然不再僅僅侷限於奧地利所屬的德意志人，而是將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馬札爾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文尼亞人及塞爾維亞人等等，盡行納入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之列。自此之後，哈布斯堡王朝也就聯合並統轄這些種類紛繁的各支民族，從 15 世紀開始，對一再企圖進軍中歐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展開進行長期且激烈的軍事鬥爭，對阻絕土耳其人之西侵歐陸貢獻卓鉅 (Vocelka, 2009: 119-26)。

至於哈布斯堡家族全面擴張其影響力於德意志、中東歐，乃至於歐陸各地，則與其所篤信的「天命論」息息相關。從腓特烈三世 (Friedrich III., 1415-1493) 在 1440 年登基為德意志國王開始，一直到 1740 年的瑪麗亞·特蕾西亞 (Maria Theresia, 1717-1780) 成為女皇的 300 年間，哈布斯堡王朝的歷代統治者發展出一項所謂的「奧地利天命論」(pietas austriaca) 的觀點，他們認為哈布斯堡家族統治基督教世界係上帝命定的必然結果，基於上帝在凡世間選擇了哈布斯堡王朝作為其在凡世間的代理人，因而哈布斯堡家族當然就被賦予權利與義務，來達成上帝之所願。因此哈布斯堡統治者從腓特烈三世以來，再三地宣示「所有世間的國度皆係奧地利的臣屬」(Alleserdreichist Österreich unterthan/Austriae est imperare omni universo)，簡稱爲 AEIOU，秉持此種天命論的觀點，使得哈布斯堡家族代代戮力於其天授使命的達成。而事實上，在整個 16 及 17 世紀期間，哈布斯堡王朝必然能夠建立世界帝國的堅定信念，在哈布斯堡家族長期掌控德意志皇位、奧地利大公國爵位、波希米亞及匈牙利王位，以及許多歐陸西部的領地，從

而成爲歐陸最強大王朝的事實而言，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愈發相信，哈布斯堡王朝遠較歐陸其他基督教國家更有資格，來作爲未來世界帝國的統治者（Beller, 2007: 37-39）。

正是基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天命論的指引下，哈布斯堡家族在數百年間將其統轄之域大舉向外擴張，涵蓋了帝國內及帝國外的疆域，同時在中歐的德意志世界及德意志世界之外的中東歐及西歐各地，扮演獨一無二的強權地位，使得帝國境內所屬的諸民族皆以哈布斯堡帝國臣民稱之。此種稱謂在 19 世紀近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前尚不構成太大問題，然而進入 19 世紀之後，隨著全歐民族主義勢力的風起雲湧，哈布斯堡帝國的多元民族結構始終在各民族自決及民族獨立的呼聲中，面臨崩解危機，雖然帝國終究維繫下來，然而民族問題始終成爲一糾結難解的內政難題，致而亦使奧地利自身所屬的認同感因而難以定型。

肆、誰是「奧地利人」（Österreicher）？

居住在一塊名爲奧地利的土地上的人民，數百年甚至千年之久，卻並未發展出以奧地利人來稱呼所屬領域內全體住民的總稱，此實涉及到前述所分析的，由於奧地利國家歷史發展上的高度複雜性，因而使奧地利人民的集體民族認同感的建構上受到有形無形的制約而難以成形。直到 1918 年之前，居住於今日奧地利版圖內的住民自視爲「德意志人」（Deutschen），然而他們只是在一個被以「奧地利」或「哈布斯堡帝國」之名交錯變換稱呼的政治單位統轄下的一個民族而已（Beller, 2007: 9）。係因這個被稱爲奧地利或哈布斯堡帝國的政治單位，其所轄的領域遠遠逾越今日奧地利共和國的疆域之外而涵蓋大片的中東歐地區，帝國所轄的大批其他種類紛繁的民族，從未接受帶有德意志意涵的奧地利人之稱謂，但願接受哈布斯堡帝國臣民或公民的名稱，此亦係哈布斯堡帝國當局爲唯繫其統治權而樂見的結果。

由於哈布斯堡家族自從 1278 年正式入主奧地利而建立其統治權以來，逐步將其版圖從上下奧地利擴張至廣大的德意志、中東歐地帶及部分西歐

地區，因而時至 18 世紀之時，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成爲一幅員極爲遼闊的大帝國。這段長期的歷史發展之中，除了 17 世紀的「三十年戰爭」(Dreißigjähriger Krieg/Thirty Years' War) 時期，曾有過短暫的波希米亞捷克人反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以及連帶地對德意志人產生明顯敵意之外，帝國所屬臣民間尚未出現明顯的民族問題，居民普遍認知到自身爲哈布斯堡帝國的臣民的狀態。

不過在此必須一提的是，即使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以一世界帝國之姿屹立於中東歐地帶，然而由於帝國統治者系出德意志重要貴冑家族，而且作爲德意志世界最大且最重要的強權身份，因而其對於廣大的德意志世界仍保有高度的威望，乃至於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在歷史發展上，儘管德意志全境自從中世紀晚期以來陷入分崩離析、群雄割據的狀態下，然而由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長期掌控德意志皇位，雖受到歐陸週遭列強的牽制而未能展其一統全德意志的雄心，然其作爲德意志世界的核心主宰地位，則屬一無庸置疑的事實。事實上歷經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從中世紀至近世在歐陸政壇上的叱咤風雲，無論在現實及精神層面上，自然而然地也對廣大的德意志世界產生了高度的威望，從而使其在政治上、經濟上及文化上等各方面，扮演著德意志世界中的領頭羊角色。德意志境內各諸侯國在推動各項政策之際，時而仍不免須以奧地利的意向而作爲後續行動的依據。同時奧地利京城維也納尤其是全德工商業及文化重心之所在，該城不僅薈集了知名的工商業者，而且文人、作家、學者及音樂家亦率皆以維也納作爲其作品發表及才藝盡情揮灑之所，奧地利成爲德意志世界眾所矚目的焦點可見一斑。此一趨勢，雖在 18 世紀中期普魯士王國崛興並開始挑戰奧地利在德意志世界的領導地位中而受到若干的衝擊，不過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具有的悠久歷史及璀璨輝煌的文化傳統，一時之間仍非新興的軍事強權普魯士王國所堪比擬。

基於上述背景使然，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從未曾忘卻，亦不可能會放棄其作爲德意志世界的核心主宰地位。亦因奧地利在德意志世界具有無可比擬的高度威望，因此奧地利作爲德意志世界之核心的想法，很自然地就深植於奧地利境內德意志人的心中。此種背景下，奧地利境內操著德語的

族群，將自身定位為德意志民族，並且是德意志民族最重要且是最核心的組成部分的想法，成為再自然也不過的常理。

然而進入 19 世紀之後，隨著民族主義的浪潮席捲全歐之後，奧地利作為德意志世界核心的想法開始受到嚴重的衝擊，此係導因於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的拿破崙戰爭波及德意志全境有以致之。自從 1806 年拿破崙大軍佔領德意志全境，德意志各個大小邦國，包括雙強—奧地利及普魯士在內盡行淪入其鐵蹄之下。在這段從 1806-1812 年間的七年時間之中，拿破崙為了達成其「壓英征俄」的政治目標，在其佔領區中進行橫徵暴斂之舉，是為「大陸政策」。德意志全境受禍尤慘，此舉進而激發了廣大德意志人民的強烈反感，並迅速刺激了集體德意志民族情感之凝聚，導致德意志民族主義聲勢急劇昂揚勃興，此一風潮明顯帶有驅逐法蘭西外來統治，以及進一步建構起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兩大終極目標。

在這段德意志民族主義澎湃洶湧之期，德意志世界的兩大強權—奧地利及普魯士，毫無疑問地成為廣大德意志各地區人民眾望之所歸。若僅就外在現狀的各類條件而言，奧地利無疑地具有著無可比擬地優勢：古老悠久的德意志資深家族威望、深厚的歷史文化、合法性、知識品味、外交禮儀、宮廷社交、世界帝國及世界級都會，以及擁有羅馬教會為後盾的天主教信仰重鎮，凡此種種皆對德意志各地人民，尤其是天主教信仰占大宗的南德，占有極強的號召力。相較之下，另一德意志強權普魯士實難以望其項背，但對於外來統治所激起的抗敵護國的決心及愛國意識，則普魯士的表現遠勝於奧地利。自從拿破崙大軍佔領下所啟動的普魯士政經社教等大規模改革行動，尤其在外來統治屈辱壓迫下所激起的反法情緒的時代背景中，進而將普魯士的精神及物質戰力催化至極限，遂使普魯士在 1813-1815 年間的解放戰爭中，一躍而成為德意志世界擊潰拿破崙大軍之表率。

即令戰後的維也納和約中，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在列強、尤其是奧相梅特涅（Klemens Fürst von Metternich, 1773-1859）的制肘之下，建立了一個結構鬆散的並以奧、普皆參與其間的德意志領邦同盟的狀態下，而暫告失利，然而奧地利長期作為德意志世界領導地位的態勢，毫無疑問地愈受普魯士的強力挑戰。在整個 19 世紀上半葉，仍一味沉緬於昔日耀眼燦爛文

化而行政官僚體系卻已呈僵化老朽之態的奧地利，面對著積極建構強大工業基礎及推動軍事實力的普魯士，此消彼長之勢在數十年間漸趨明朗並為之確立 (Heer, 2001: 186)。在時人普遍的認知下，普魯士正秉承著上帝所賦予的「德意志民族的使命」，其終極目標在於帶領全體德意志人而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統一 (Tu, 2009: 37-38)。1866 年普奧戰爭中普魯士重創奧地利的結果，不過是針對上述發展而所完成的最後確認。

當然就奧地利德意志民族的認同情感而言，面對著普魯士逐步力壓奧地利而逐步取得廣大德意志民族認同之所歸之際，亟欲在這股民族激情的氛圍中，以其傳統上作為德意志民族核心要地的態勢，繼續扮演其不可或缺的要角地位。尤其是群聚於哈布斯堡帝國所轄的奧地利及波希米亞地區，向來掌控著政經社優勢的德意志人，他們受到強烈德意志民族共同情感的驅使，極度期待未來的德意志民族國家能夠涵蓋哈布斯堡帝國所屬的德意志人聚居區，甚至以奧地利德人作為未來德意志民族國家的領導要角，此即所謂『大德意志方案』 (Großdeutsche Lösung Greater German Solution)。然而此種主張不僅令哈布斯堡帝國境內其他民族，尤其是與德人生存領域彼此重疊的斯拉夫人 (捷克人、斯洛文尼亞人) 大為緊張 (杜子信, 2014a: 17-21)，亦不為哈布斯堡帝國統治當局所接受，係因此種想法無異於將哈布斯堡帝國全面肢解。然而受制於國際因素及 1866 年普奧戰爭結束，奧地利戰敗而使普魯士所主導的『小德意志方案』 (Kleindeutsche Lösung/Lesser German Solution) 的全面勝出之後，奧地利及波希米亞德人完全被摒除在德意志民族國家之外，此種發展自不免使得哈布斯堡帝國境內的德意志人在民族情感上劇受衝擊。

自 19 世紀後期以來，被全面排除於德意志世界之外的奧地利，向來掌控政經社優勢並長期以身居統治民族的德意志人，在面對著奧帝國在翌年 (1867) 重組為奧匈雙元帝國的歷程中，不僅頓時淪為帝國少數民族，且昔日所享有的特權亦在帝國其他民族不斷爭權的歷程中逐步流失，此一背景下，致而引發其嚴重的生存危機感。就在奧地利德人認同歸屬感深陷危機之際，由普魯士所領導的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正是經歷擊潰拿破崙三世、完成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建構，並且一舉將德意志民族的地位提昇至歐

陸要角的地位之際。身為德意志民族的無上光榮自豪感，此時自然而然地也在哈布斯堡帝國境內的奧地利及波希米亞地區的德人聚居區中，產生了一股與有榮焉之感。此種德意志認同感，尤其在所屬哈布斯堡帝國中央虛弱無力，而帝國境內數量居於優勢的其他民族政經社實力隱然有凌駕於德人之上的威脅下，格外對波希米亞及奧地利德人形成一股強烈吸引力（Heer, 2001: 285-87）。於是在這股強烈的德意志民族認同感的導引之下，他們因而以自身所屬族群而堅持自稱德意志人，或依所屬地域而自稱奧地利德意志人。在哈布斯堡帝國境內的德意志人，就採取此種自我族群認同及稱謂，一直堅持至哈布斯堡帝國在一戰的戰敗而全面解體而仍不輟。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原本掌控廣大中東歐地區的哈布斯堡帝國崩解，帝國所屬各民族紛紛在協約國的支持下，依照民族自決的原則而在中東歐地區成立了許多新興的國家，此際奧地利及波希米亞的德人聚集區亦宣佈成立「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Republik Deutsch-Österreich），凸顯他們作為德意志民族屬性的特點，不過對於這個新興國度的人民而言，這個小型的共和國僅係過渡措施，奧地利及波希米亞德人實則希望未來能夠與德國進行終極合併。然而在協約國尤其是法國的主導下，1919 年所簽署的『聖日曼茵條約』（*Staatsvertrag von Saint-Germain-en-Laye/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中，不僅德奧合併的想法被徹底否決，甚至連波希米亞德人聚居區亦被劃入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疆域之中⁴，奧

⁴ 這個區域就是位於環波希米亞週遭的山群地區，包括波希米亞森林山脈（Böhmerwald/Bohemian Forest）、礦山（Erzgebirge）及蘇台德山（Höhen der Sudeten/Sudeten Mts.），其中尤以蘇台德山區所匯集的德人最為密集，因而後來「蘇台德德意志人」（Sudentendeutschen）的概念，就被用以泛稱波希米亞或捷克境內的全體德意志人的用語。當時蘇台德德意志人的人口總數高達 350 萬之譜，成為新興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境內數量最大的少數民族，日後這些波希米亞德意志人在希特勒及其國社黨人於 1933 年「攫取政權」而推翻了威瑪共和國體制之後，受到納粹德國持續不斷的宣傳挑撥及煽惑，遂出現自治的呼聲，並逐漸發展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內政上的一大隱憂。到了 1938 年 8 月，在希特勒蓄意的介入煽動之下，終於衍生成為幾乎引爆大戰的國際危機，是為「蘇台德問題」（Sudetenfrage）。其後德義英法四國在南德慕尼黑進行會議，英法政府為了避免戰爭爆發，最終決定犧牲捷克的權益而將整片蘇台德地區劃給納粹德國，然此舉仍未能滿足希特勒向外侵略的野心，半年之後，納粹德軍旋即開進捷京布拉格，完全吞併捷克，斯洛伐克則成納粹德國的保護國。

地利德意志人在協約國的安排下，被迫以一個新興的奧地利共和國公民行之於世，然與此同時，其德意志人的認同感仍維繫不墜，並以本質類似的其他用詞而稱呼自身。

在 1919-1938 年這段被稱為奧地利「第一共和」時期期間，奧地利人民的自我認同先後出現數項稱謂：除了奧地利德意志人一如既往般地被使用之外，另外也有所謂「泛德意志人」(Alldeutschen)或「帝國德意志人」(Reichdeutschen)等稱謂的被使用，係因受制於國際社會阻止德奧合併的無奈，許多奧地利德意志人希望能以昔日的德意志第一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為典範，將當時的威瑪共和國及奧地利共和國合組成一個鬆散的德意志聯邦國家的型態(Herr, 2001: 386-88)。與此同時，亦有若干奧地利德意志人有鑑於德國屢遭國際社會批判，認定其須對挑起一戰的罪行而負責，因而奧地利德意志人轉而強調奧地利是具有悠久燦爛的文化傳統，所以奧地利德意志人係屬「優秀的德意志人」(Gute Deutschen)，藉此與帶有普魯士軍國主義思想的德國德意志人作出明顯的區隔，尤其自 1933 年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攫取(德國)政權」(Machtergreifung)及其後德國再武裝之後，抱持此種觀點的奧地利人民日漸增多。這段期間，維也納長期以來作為德意志世界文化之都的觀點，不斷被奧地利德意志人所強調，因此歷史上重要的文學家、詩人、哲人、藝術家、音樂家或作曲家皆選擇奧地利所在的維也納作為其發表、初演及安身立命之處，而維也納作為德意志世界、甚至是全歐的時尚之都，蘊育出諸如瑪利亞·特蕾西亞、法蘭茨·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1830-1916)、西西公主(Elisabeth Amalie Eugenie, Kaiserin Elisabeth von Österreich/Empress Elisabeth of Austria, 1837-1898)，以及美泉宮(Schloß Schönbrunn)的巴洛克文化氛圍，更為奧地利德意志人所津津樂道，並且引以為傲，這種特意以悠久文化來作為奧地利與德國鮮明區別的作法，一如先前所提，在當時的目的係為強調奧地利德意志人是以文化為本，而明顯有別於以軍事為尚的德國德意志人，以此強調他們是無需承擔戰爭罪行指責的「優秀德意志人」。值得一提的是，此種論點在當時僅在於區分出同屬德意志民族框架下的個別差異，不過在二戰結束後，此種觀點進一步得到強化與確認，並進而成為型塑奧地利民

族的關鍵論點 (Vocelka, 2009: 16)。

不過在當時，隨著 1938 年納粹德國「合併奧地利」(Anschluss Österreichs) 之後，奧地利德意志人稍稍產生出突顯文化特色來區別於德國德意志人的認同感，迅即又為德意志民族身份所取代(壓制)，當然這種全盤融入德意志民族認同感的發展，並非全然源自被迫，實則有絕大比率的奧地利德人是自發自願地重新成為廣大德意志民族之一員。係因德意志第三帝國在先前藉由廢除凡爾賽和約、重整軍備、恢復經濟榮景、收回薩爾區及進軍萊茵河左岸非武裝區等一系列行動中，徹底摒除了德意志民族自一戰以來所承受的恥辱，大幅鼓舞了德意志民族自尊心(杜子信, 2014b: 225-90)，加之希特勒本人出身奧地利，遂對時處於政經失序的奧地利第一共和國產生了難以抗拒的誘惑力，因而先前曾發展出以文化特色來突顯奧地利德意志人與德國德意志人間不同的認同感，旋即在這股強大德意志民族優越感的時代風潮中迅速消聲匿跡。自此之後不僅奧地利被重新冠上該地在歷史上最初始的稱謂—東部邊區(Ostmark)，成為所謂「大德意志帝國」(Das Grossdeutsche Reich) 東南方的一個核心轄區，而且奧地利德人也在這股激情昂揚的民族情感中，從 1938-1945 年間被納入所謂「優秀的亞利安或日耳曼人種中的德意志民族」之列，最後亦隨著納粹德國的興亡而與之俱榮俱毀(Niederstätter, 2007: 232-37)。

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基於二戰對奧地利全境所帶來的鉅大傷痛，以及全歐各國所呈現的強烈反德情緒，同時奧地利各界亟欲擺脫在二戰期間奧地利人民參與、共謀，並犯下的戰爭罪行，使得向來自視為德意志民族一分子的奧地利人民，轉而重新尋求自身的定位。此一時期許多奧地利人民，尤其因為不願受到納粹德國發動世界大戰及犯下戰爭罪行的牽累，因而有意識地與德國(無論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皆然)，以及德意志人作切割，他們期望儘速擺脫與德意志意涵及德國相關的事務。因而先前曾提到，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植基並強調文化特色而呈現出與德國德意志人有別的所謂「優秀的德意志人」認同感，在此就逐步轉化成為一種新興的奧地利人的自我民族認同感，並且從此之後，逐漸為奧地利人民廣為採納並迅速根植於奧地利人

民心中，奧地利國族的建構—「奧地利人」的認同感因而快速發展，尤其自 1955 年『奧地利國家條約』(*Österreichischer Staatsvertrag/Austrian State Treaty*) 簽署，奧地利成爲中立國並重獲完整的主權之後，奧地利人民自認爲奧地利人的比率首度超越德意志人(49% 對 46%) (Vocelka, 2009: 17)，其後更是在奧地利政府大力的推展及學校教育政策的全面配合之下，奧地利人對德意志人認同比率的差距不斷拉大，奧地利民族的認同感不斷擴增而德意志民族的認同感則愈見萎縮，從 1960-1970 年代之時，奧地利人的認同感已呈現出壓倒性的優勢而完全定型化，最後到了 1980 年代末期，奧地利人的認同感比率已超過 9 成，於此同時德意志人的認同則僅餘個位數字的比率，奧地利(第二)共和國所屬的人民即是奧地利人，成爲再自然不過的常理 (Vocelka, 2009: 17)。

伍、結論

當代許多歷史學家在論及奧地利史時，普遍會以「奧地利史是一部沒有國族的國家發展史」來評論歷時千年之久的奧地利歷史 (Beller, 2007: 9)，從本文前面篇章所析論的奧地利複雜歷史的發展來看，吾人正可由此一評論窺探出何以奧地利人認同感的型塑會發展得如此之晚及屢受波折。事實上這個原屬德意志東南邊陲地帶所發展起來的政治單位，歷經了數百年在德意志及中東歐地區的擴張及發展，從而晉升成爲一強大的多元族群帝國，原本這在當時的王朝家族統治的時代背景中，並不特別突出，卻未料及後來近代民族主義的洶湧發展，致使哈布斯堡多元族群大帝國，面臨難以爲繼的現象，其間德意志人雖爲主體民族，然而卻難以建構成爲德意志所屬國度的認同。這期間除了哈布斯堡帝國境內有著數量佔有絕對優勢的其他民族，其在澎湃洶湧的民族主義浪潮下而不斷地向奧帝國中央爭權，從而使奧地利德人政經社優勢地位逐步淪喪之外，尤爲重要之因則爲另一德意志強權—普魯士的興起，侵蝕乃至於取代了原先奧地利在德意志世界的威望及主導地位。

由於普魯士憑藉著自 19 世紀初解放戰爭前後以來所建立起的高度軍

事、政治與行政效率，相較於奧地利在抗法戰爭及因應帝國政局所呈現的虛弱無力之態，普強奧弱之勢可謂對比鮮明，在此一背景下，普魯士逐步贏得廣大德意志世界之民心，實屬常理。奧地利雖欲以其悠久歷史、名震四方的家族威名、德意志皇權的合法性、宮廷文化、世界性帝國與都會，乃至於羅馬教會的堅定支持，繼續鞏固維繫其於德意志世界的領導地位，然而已難阻遏普魯士取代奧地利成為德意志世界共主之勢。整個 19 世紀上半葉，普魯士政經軍形勢在快速工業化的歷程中一日千里，奧地利則受困於內部多元民族問題而使內政深陷僵化之態，從而使奧地利在這場德意志世界領導權及德意志民族統一之爭中，完全落入下風而無力與普魯士爭衡。隨著未來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在普魯士的領導之下的態勢，已成勢所必然之際，連帶地普魯士所轄及與之結盟的德意志各邦之地，也逐步贏得了德意志民族的認同之爭，係因由強盛的普魯士而非弱勢的奧地利所領導的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給予了絕大部分的德意志民族對於民族前景無比的厚望。

1866 年奧軍在普奧戰爭的失利而被排除在德意志世界之外，尤其在 1870-1871 年由普魯士所領導的德意志聯軍擊潰了法蘭西大軍而締建了德意志第二帝國，一舉完成了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之後，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完全獨享了德意志民族認同感的光環。與之相對的，哈布斯堡帝國頓時失去昔日對大部分德意志地區、尤其長期以來對南德意志地區所享有的高度文化及政治威望，奧地利德人從原本長期以來身居德意志世界領導者而享有高度知識文化及政治光環的地位，頓時陷入根基俱失的狀態之中。其後並隨著 19 世紀後半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國際間扮演著一級強權的地位，使得第二帝國完全成為德意志民族自豪感及認同感之依歸，連帶地對其時哈布斯堡帝國內深陷多元族群泥淖、而使政經社優勢地位不斷流失的奧地利德意志人產生強烈磁吸效應，此種背景下，使得奧地利難以形塑出自我認同意識。

直到一戰結束後至 1938 年間，為了擺脫德國發動戰爭的罵名，奧地利人民對自身定位及其與德意志民族的關係，才建構出以一種在德意志民族共同架構之下而以文化作區別的特點，遂出現「泛德意志人」、「帝國德

意志人」及「優秀德意志人」等等自我認同感，試圖以悠久的文化資產來作為奧地利德人與具有軍國色彩的威瑪及第三帝國德人之間的明確區別，然而終究不敵 1930 年代希特勒及納粹黨人崛興的歷程中所捲起的狂熱德意志民族狂潮，此一微弱的奧地利自我認同感旋遭「優秀日耳曼人種的德意志民族」思想所全面吞噬。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迫於外在國際局勢的變化及全歐仇德情緒的瀰漫，同時亦極力避免二戰參與並共謀納粹的戰爭罪行遭到揭發，終使奧地利人開始發展自身所屬的認同感，他們以之前曾短暫發展出來的文化至上觀為基礎，大力透過政經社措施及教育體系的推廣，使得奧地利人的認同感快速傳播，德意志民族的觀念漸遭揚棄，而奧地利民族的觀點則逐步深植於奧地利各界之中，德消奧長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時至 1980 年代，奧地利國族的建構—奧地利民族終底於成。

參考文獻

- 杜子信，1998。《德意志民族東向移民運動之探討－希特勒生存空間論之歷史源起》碩士論文。淡水：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 杜子信，2014a。〈奧匈雙元帝國的民族問題與危機〉《歷史知識－行家開講世界史》。台北：三民出版社。
- 杜子信，2014b。〈薩爾問題：德法諒解及歐洲整合的關鍵〉《成大歷史學報》46期，頁 225-90。
- Beller, Steven. 2007.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Wien: Böhlau Verlag.
- Herr, Friedrich. 2001. *Der Kampf um die österreichische Identität*. Wien: Böhlau Verlag.
- Kinder, Hermann, und Werner Hilgemann. 1964. *dtv-Atlas zur Weltgeschichte – Karte und chronologischer Abriß – von der Anfängen bis zur Fränkischen Revolution*, Band 1.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 Niederstätter, Alois. 2007.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Stuttgart: Verlag W. Kohlhammer.
- Raff, Dieter. 1987. *Deutsche Geschichte –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München: Max Hueber Verlag.
- Schödl, Günter. 1995.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 – Land an der Donau*. Berlin: Wolf Jobst Siedler Verlag.
- Tu, Tzu-hsin. 2009. *Die Deutsche Ostsiedlung als Ideologie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s*. Kassel: Kassel University Press.
- Vocelka, Karl. 2009.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München: Wilhelm Heyne Verlag.
- Waschek, Hans. 1996. *1000 Jahre Österreich*. München: Wilhelm Heyne Verlag.

Nation-building and Identity-formation in Austria

Tzu-hsin Tu

*Assistant Professor, Basic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chung, TAIWAN*

Abstract

A history of Austria is very often known as a histo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without her subjectivity as a nation. Since the late Middle Ages, Austria has gradually exerted its influence in the German world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Numerous nations were under Austria's rule. This makes Austria achieve hegemony in Europe. However, as the tide of nationalism of the 19th century swept Europe, these numerous nations and peoples were fatal for Austria to construct a unified national self-identity, which was even rejected by the authority of Habsburg Empire. Until the end of World War I,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First Republic, Austria appeared as a country of one-nation. Despite of this, Austria had difficulty in building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because of the restraints entrenched and complicated in German identity and German history and culture since long. Until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and efforts to get rid of being implicated in war criminals, Austria national identity developed and fixate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build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ustria. Exploration into complic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istory of Austria helps clarify the difficulty in building an Austrian nation in the vicissitudes of history.

Keywords: Austria, Ostmark, Habsburg Empire, Germans, Austrians